

# 編後語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是圍繞中外科學發展史的兩篇文章。范岱年回顧了從1915年到90年代中國大陸學界對所謂「李約瑟問題」的探討，材料翔實，評述客觀。從該文可以看到，關於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的第一次討論，是伴隨1915年新文化運動而開始，並一直延續到40年代末，但主要集中在科學界。此後它沉寂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到80年代初，這一問題被再次提出並引發討論熱潮，討論較前深入並且引起廣泛關注，成為思想解放運動和文化熱的重要部分。陳方正的文章則具有挑戰性。他以闡釋西方科學起源和發展為主線，對近代科學出現以前，中西科學水平相差不遠這一普遍看法提出質疑。他又指出，西方科學起源有比中國更為悠久的歷史，其後形成了可稱之為第一次科學革命的希臘推理傳統，在這傳統的基礎之上才談得到近代科學革命。由於中國歷史上從沒有出現科學推理傳統，也就根本說不上具有近代科學革命的可能性。可以看到，中國人對這一問題的關切是同追求現代化目標聯繫在一起的，相信它對中國學界仍將是持久而有魅力的論題。

本刊過去較少從國際化視野討論中國近代史。今期「百年中國」哈佛大學柯偉林談民國時期國際化的重要論文和王冠華闡述晚清赴南美華工及其引起的中外關係問題的論文，可以說是彌補了以往的不足。本期「讀書：評論與思考」欄也很有吸引力，圍繞獲得今年美國亞洲學會列文森最佳著作獎的何偉亞新著《懷柔遠人：清代的賓禮與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有兩篇美國中國學學界的辯論文章。周錫瑞指出該書有相當多史料錯誤，並對運用後現代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提出質疑；而艾爾曼和胡志德則針鋒相對地反駁了上述兩方面的批評。這組討論還進一步涉及歷史史料和理論的運用，以及與美國學界現在最熱衷談論的「政治正確性」的關係問題。

楊振寧的〈父親和我〉不僅是一位傑出科學家充滿真情的懷念文字，而且還清晰顯示這個孕育了近代中國兩代受西方教育的科學家家庭的兩種精神傳承：強烈的中國民族感情和西方科學精神。此外，錢永祥的文章概述了剛剛於11月5日病逝的哲學家柏林的思想精華和他對二十世紀思想的巨大影響。余華的短文有助我們了解他的創作原則，而馬欽忠談白話文運動和張英進分析中國電影的民族性和國家話語，也都各有獨特見地。羅崗、陳思和和謝泳等分別談吳宓、陳寅恪、顧頡剛三位著名學者的短文，涉及1949年以後中國知識份子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窘迫，從而提出學者的民間崗位在哪裏的問題。最後，編輯本期時正值亞洲金融風暴擴及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日本，中國是否也存在類似的金融危機？會不會受到波及？何清漣對中國金融現況兼有數據和對比分析的文章，為此提出了一個看法。